

海外杰出华人学者论丛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  
测量与分析

(美) 陈捷 著  
安佳 译

测量与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  
测量与分析

(美) 陈捷 著  
安佳 译

·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陈捷著;安佳译.—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6

(海外杰出华人学者论丛)

书名原文: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ISBN 978 - 7 - 306 - 03906 - 4

I. 中… II. ①陈… ②安… III. 公民—参与管理—研究—  
中国—1995 ~ 1999 IV. D62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627 号

---

出版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葛 洪

责任编辑: 葛 洪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宗 隐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8.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中文版前言

事实上，民意的概念在中西方出现的历史都颇为久远。在中国，《尚书·酒诰》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西周的周公用此格言劝诫当政者从民心来监察自己的统治，这样统治才会长治久安，而不会因失去民心而失天下。司马迁更是将对民意关注的源头追溯至商汤，他在《史记·殷本纪》中曾记载：“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都有类似思想。《管子·牧民》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行，在废民心。”《庄子·杂篇·说剑》有“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荀子》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朝初期魏征和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转引《荀子》的观点。《贞观政要·论政体》有“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此外，我国历代帝王多有微服私访的经历，他们的用意就在于体恤民情，以确保民意上达的畅通与真实。

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上类似民意的概念也同样斑斑可考。虽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不使用民意二字，但早期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经常提到大众意见并强调其重要性。西方民意观念的兴起则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巴斯卡、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莎士比亚和天普尔的作品都屡屡提到大众意

见的重要性。民意的重要思想显见于卢梭的作品，法国大革命促成更为广泛的对民意的讨论。

现代意义上的民意研究则产生于18世纪后。早期民意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对选举进行模拟投票或称假投票，如182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报》通过询问路人的方式预测是亚当斯还是杰克逊当选总统。20世纪前期，美国《文学文摘》杂志发展出一种“声望调查”，曾连续5次精确预测总统选举结果。盖洛普在其《民意测验指南》中说明民意调查的主要功用之一是提供准确、快速的民意报告，从而加速民主政治的过程。目前民意调查已经被世界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民意调查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运作过程和调查方法体系。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民意调查的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外国政府对民意的利用，在许多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将国外的民意调查看做是公共舆论的“晴雨表”，公共舆论作为国外政府决策的“风向标”，长期以来受到从国会议员到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以美国为例，民意调查的数据可以被任何当选的官员有效地使用，总统对它的运用最为明显，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应用民意调查，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再到地方政府都通过民意调查来收集数据。从国际政治层面上讲，民意可以使外交决策者在与他国谈判时更具讨价还价的筹码，民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外交决策者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

早在1922年，中国就曾经有开展民意调查的尝试。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只有零星小规模的意见调查活动，局限于报业对读者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民意调查未再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意调查活动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恢复起来，各类民意调查活动蓬勃发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方面。随着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民意调查成为各级政府和专门调查部门的重要活动，1998年国家统计局建立

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在多次会议上提议各地成立民意调查中心, 其主要社会背景是,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00 美元的情况下, 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掌握民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2004 年初, 国家统计局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各省市统计部门尽快建立“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 积极开展社情民意调查。2006 年,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表明, 依据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 系统地、有效地“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8 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报告》显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极大丰富了信息的形式与内容, 拓展了信息的传播范围, 提升了信息的应用价值。信息已不仅是创作科学知识的辅助要素, 在信息化环境中, 通过信息汇聚、知识挖掘、虚拟现实、超级计算、网络协同等形式, 可以进一步聚焦前沿、解析复杂系统、梳理科学问题、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加快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加速人们工作与生活方式的变革, 对我国政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而引导社会全面发展。这一切均凸显了展开舆情与民意研究, 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时代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征。在利益多元、重组、分化、矛盾和冲突中, 社会主要矛盾必然由社会生产领域的经济矛盾逐渐向社会分配领域的政治矛盾转变, 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民意的兴起这一转变无疑在加速推进。据此适时开展舆情与民意研究, 是建设“服务性政府”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 是构建和谐社会、调整政治关系的独特纽带, 是推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必要的辅助平台。诸多因素聚合起来促使民意在广泛的领域内被应用。公共意识的兴起是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民主行政、参与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服务行政、责任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架起政府与公众沟通桥梁的必然要求。

经过自 20 世纪 7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及社会重大变迁，中国老百姓到底还支持不支持政府？如果他们还支持，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在西方和中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曾试图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但绝大多数的回答主要是基于抽象的推理或个案研究。这些推理及个案研究往往不能得出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结论。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书的初衷就是要以随机抽样以及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对这些问题提出更具代表性和系统性的答案。同时，我也希望本书提出的这些答案能为后来对此课题的研究奠定理论与实证基础。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本书中所提出的结论曾被多次引用。

从理论上来看，本书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关于“公众政治支持学说”的基础上。伊斯顿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学说。从那时起，这一学说曾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尤其是那些国家的民众对政府支持）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之前，伊斯顿关于大众政治支持的理论还从未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运用过。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也是对政治支持理论在研究中国政治中运用的一次最初的尝试。正如本书所阐述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的，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伊斯顿关于大众政治支持的学说完全适用于中国政治的研究，特别是用于大众对政府态度的研究。由此，这一结果也为将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路径。

另外，从方法论上来看，本书也是对随机抽样和数理统计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大众政治支持中的第一次尝试。具体来说，这一研究是在对北京市民随机抽样调查并对此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的基础上完成的。此研究自始至终遵循了规范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调查样本的选择到调查数据的分析。因此，本书又曾被一些教学及研究机构用来作为示范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及工具书。

本书的英文版在2004年出版后，得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好评。例如，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曾在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评论道：这部著作“为研究公众的政治观点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起点；从这一起点我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民众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及社会重大变迁后是如何看待政府的”。这位专家接着说道：“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政治学方法论非常精辟的介绍，尤其是这一方法论在研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治中的运用。因此，所有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都会发现此书对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本书已经出版5年了，但是书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观点、所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还在对研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着积极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影响目前还主要局限于英语世界。基于这一原因，同时同仁们的鼓励下，我们将本书翻译出版，以飨中文读者。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凝聚了许多同仁和朋友们的努力。在此，我特别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安佳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们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编辑葛洪先生的鼓励及指导，以及中山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总之，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支持，本书的中文版就不可能问世。当然，我本人对书中所有可能的遗缺及错误负责。

陈捷

2009年6月于上海



## 英文版鸣谢

在本书谈到的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我有幸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多家学术及研究机构的支持。首先，我要由衷感谢我的同事和友人的宝贵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刘夏阳，他们帮助我设计和实施了在北京的调查，这些调查是本书的基础。罗伯特·哈撒韦（Robert Hathaway）、林钢、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L. 克里斯·瑞尔顿（L. Chris Reardon）、赵继宏、钟扬和周永明对本书最初的主要论点和结构提供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约书亚·贝尔（Joshua Behr）和罗伯特·霍尔登（Robert Holden）老练而细致地编辑了本书的初版。布鲁斯·狄克逊（Bruce Dickson）、戴维·香博（David Shanbaugh）、唐文方和匿名审稿人对本书的最后定稿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具体建议。

我要感谢几家机构在促进我的研究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舆论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最具声望的民意研究机构中的一个，它帮助我完成了最富职业水准的北京民意调查。我很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亚洲研究中心，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它们为我提供了慷慨的资助以及协助我研究的专业人员；富布赖特学者计划资助我与此研究项目相关的活动；欧道明大学、田纳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河城分校在本项目进行过程中提供的研究经费。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两家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莫瑞尔·贝尔和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的乔·布林利，他们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通力合作。在本书评审和出版过程中，两位编辑热情地支持我和这一研究项目。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实质性和技术性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极有帮助。我还要感谢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的亚米尔·卡恩在两家出版社之间所作的大量的协调，在出版制作过程中给予的具体指导。

最后，我想对我的妻子表达多重谢意，感谢她心甘情愿地忍受我沉迷于此研究项目。她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而我的研究工作有时候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涯和我对家庭的责任。虽然我确实努力在家庭需要和研究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但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我妻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作出的牺牲。因为深感有负于她，我把本书题献给我妻燕平。

# 目 录

|                  |      |
|------------------|------|
| 第1章 导论           | (1)  |
|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 (3)  |
| 研究数据             | (15) |
| 本书概述             | (19) |
| 第2章 北京的公众政治支持度   | (21) |
| 对政治支持的测度         | (21) |
| 北京公众对政体的普遍支持度    | (27) |
| 北京公众对政策的特定支持程度   | (36) |
| 概述和总结            | (52) |
| 第3章 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关系 | (55) |
| 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差别     | (55) |
| 政治支持两个维度的关系      | (64) |

|                   |           |
|-------------------|-----------|
| 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相互作用    |           |
| 对政治稳定的意义          | (69)      |
| 概述和总结             | (73)      |
| <br>第4章 普遍支持的来源   | <br>(76)  |
| 社会人口因素对普遍支持的影响    | (77)      |
| 高政治取向对普遍支持的影响     | (95)      |
| 低政治取向对普遍支持的影响     | (106)     |
| 多变量分析             | (111)     |
| 概述和总结             | (115)     |
| <br>第5章 特定支持的来源   | <br>(118) |
| 社会人口属性对特定支持的影响    | (118)     |
| 高政治取向对特定支持的影响     | (132)     |
| 低政治取向对特定支持的影响     | (137)     |
| 多变量分析             | (143)     |
| 概述和总结             | (147)     |
| <br>第6章 政治支持的行为结果 | <br>(149) |
| 公众的政治参与           | (149)     |
| 政治支持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 (164)     |
| 多变量分析             | (169)     |
| 概述和总结             | (174)     |

|                 |       |
|-----------------|-------|
| 第7章 结论：实证结果及其   |       |
| 政治含义            | (177) |
| 主要的实证结果         | (178) |
|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长处和弱点   | (180) |
|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挑战    | (182) |
| 附录1 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指数 |       |
| 的可信度            | (192) |
| 附录2 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分布 |       |
| 的补充信息           | (197) |
| 参考文献            | (199) |
| 索引              | (241) |

## 第1章 导 论

在海外，大家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缺乏公众支持和合法性。因此，在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碰到了很多难题。那么，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否享有公众的支持吗？中国公众为什么支持或不支持政府？中国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或不支持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民意基础，而且对我们评价中国的政治前景都至关重要。本书基于1995—1999年在北京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的数据，力求回答这些重要问题。

公众政治支持 (political support) 不仅仅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所有类型国家的整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对公众支持或政治支持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但许多研究表明，公众支持对任何政府行使其政府职能、维持政府的执政体都至关重要（参见 Easton, 1965; Lujan, 1974; Rose and Mishler, 2000）。在民主体制下，政治支持程度对政府行使职能和维持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危机时期），因为民主政府只有与人民保持一致，才能存在和运作（参见 Lipset, 1959, 1960; Miller, 1974a; Seligson and Muller, 1987; Finkel et al., 1989）。在非民主政体下，政治支持的长期缺失，可能最终导致政治动荡，甚至导致“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化”（Miller,

1974b, 951)。比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出现了这种政治动荡和革命性变化(参见 Pakulski, 1986; White, 1986; Avery, 1988; Palma, 1991)。总之, 正如英格尔哈特所说, “具有合法政府体制(即享有政治支持)的社会, 比那些不享有政治支持的社会更易生存下去”(Inglehart, 1997, 15)。

由于这一主题具有如此明显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有很多以民意调查为基础的对民主国家政治支持中的实证研究。<sup>①</sup> 遗憾的是, 类似对非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支持的研究却难得一见<sup>②</sup>; 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支持研究则几乎阙如<sup>③</sup>。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探索中国城市中公众政治支持的程度、其社会政治原因和行为后果来弥补这一缺憾。因为政治支持和现政府有效性之间存在一种强相关关系。因此, 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活力。最后, 本书还将阐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前景, 这也是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每章的后面我都会给出简短的总结。

在本书第 1 章, 我将讨论我研究当代中国公众政治支持所采用的理论及方法, 并描述和分析中国公众政治支持所依据的实证数据。

---

① 对这类研究的综合评论, 见 Reef and Knoke (1999) 和 Citrin and Muste (1999)。

② 仅有少数例外, 包括 Lujan (1974), Miller (1993), Geddes and Zaller (1989) 和 Rose and Mishler (2000)。

③ 仅有的例外见 Chen et al. (1997)。

##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书的分析主要依据伊斯顿政治支持的理论框架来进行，但也借鉴了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研究。虽然源自伊斯顿经典著作（Easton, 1965, 1975）的理论框架已经引发了若干批评，<sup>①</sup>但许多分析家还是一直在应用他的理论并加以修正（Muller, 1970a 和 1970b; Lujan, 1974; Muller and Jukam, 1977; Muller, Jukam, and Seligson, 1982; Seligson and Muller, 1987; Finkel, Muller and Seligson, 1989; Gibon and Caldeira, 1992; Kornberg and Clarke, 1992; Miller, 1993; Gibson, Caldeira and Baird, 1998; Hetherington, 1998）。在本书中，我并不是要理清对伊斯顿理论的争论。相反，只是从伊斯顿理论框架中选取有用的见解来对当代中国进行系统分析。具体而言，伊斯顿的卓见为探究政治支持及其社会政治起因和行为后果奠定了基础。

### 对政治支持的界定

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根据伊斯顿理论体系进行界定的。伊斯顿对政治支持的定义是这样的：“当甲代表乙从事活动，或者甲对乙表示赞同，我们可以说，甲是支持乙的。乙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目标，一种想法，或一个机构。以行动来支持，我叫做显性支持；以态度和情感来支持，我叫做隐性支持。”

---

<sup>①</sup> 这些批评可以分为两类——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方法论的批评，如 Loewenberg (1971), Miller (1974a 和 1974b), Citrin (1974) 和 Zimmermann (1979) 指出，从经验上区分和衡量政治支持的两个维度存在困难。理论的批评，如 Rogowski (1983) 坚持认为，遵循伊斯顿理论的分析人员错误地假定，人民可以在他们从政治体制中希望得到的和政治体制实际所能给予他们的之间建立认知联系。



(Easton, 1965, 159) 伊斯顿进一步对“隐性支持”(即本书所指的“政治支持”)所指的三个主要对象进行了确指,这三种主要对象即政体、当局和政治共同体。根据伊斯顿的理论(Easton, 1965, 11—13),政体常常作为最重要的对象,指政府的基本价值、规则和机构;当局不仅包括现任领导人,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领袖;政治共同体则指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业而维系在一起的人群。

就政治支持而言,伊斯顿区分了政治支持的二元维度——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Easton, 1965, 1975)。相比之下普遍支持是一个更具影响的维度,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判断,即政府的存在和运转是否符合他或她有关政治领域内何谓正义的道德原则或价值观念。在上述三个政治对象中,政体是普遍支持的基本对象。公民与政体的联系,源于他们对政府的基本价值、规则和组织机构的评价。正如伊斯顿本人所指出的(Easton, 1965, 278):公民对政体的支持是“制约和调适普遍支持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对政体的普遍支持也是对政体的“合法性的确信”(Easton, 1965, 第18章)。具体而言,根据伊斯顿理论体系,在本书中,普遍支持是指中国公民对现政体倡导的基本价值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sup>①</sup>的支持态度。

特定支持有别于普遍支持,它是衡量一个人对现行具体政策和政府政绩的满意程度的。在三个政治对象中,当局是特定支持的基本对象。公民对政治当局的特定支持,源于他们对当局的政策结果的感知和评价。此外,特定支持有“特定的对象”:“人民意识到或者可以意识到政治当局——指应对以政治制度之名而实施的日常事务负责的人。”(Easton, 1975, 437)基于这一概念,本书的特定支持指中国公民对中国执政的中央当局处理主要

① 对受访者这类态度的度量将在第2章作详细讨论。